

红卫兵奥斯汀：论身份机会主义

译者：哈扎尔学会

Red Guards Austin/文 索索/译

原题：论身份机会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帝国主义中心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On Identity Opportunism: Postmodern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imperialist center)

原编者按：今天，对“白左”、“政治正确”的批评已经成为中国网络舆论中的流行现象。然而，在这种貌似“硬核”和自命“唯物主义”的风潮中，却鲜见欧美本土共产主义者分析相关问题的文章在国内网络上传播。为此，我们推送美国共产主义者关于“身份政治”的一篇文章，即既如何既拒斥白人极右，又坚持对身份政治的批判。

实事求是地说，这篇文章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对其他派别的评价就带有历史形成的、我们所不能赞成的狭隘色彩，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也含有武断成分(或文中所指认的一些现象是否可归结在“后现代主义”这一名词下，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文章存在缺陷且没有给出既定答案的话，它仍然强调了一种极其可贵的意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明确超越“键政”风气，必须激活和追求严肃的政治思考与政治实践。

就中美两国的具体意识形态条件而言，“身份政治”在两国的角色和地位有显著的不同，所以不能照搬它他国的结论。首先，一些“传统 left”对各种社会运动毫不关心，或者沦为保守乃至反动的“红色”话语，或者把阶级维度的“中心性”理解为“排他性”，从而导向了货真价实的狭隘主义；另一方面，在对前一种倾向的反对中，也出现了不加理论辨析的、道德主义的立场，出现了局限于站队姿态的现象。在文字上摆出一种“批评两种错误倾向”的态度是容易的，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这种空泛的正确，而是 left 必须通过自己的参与，把任何人对结构性问题的关注引向对现实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反对。

正文：

“这个地方，我已经向你解说。

悲惨的群伦，你会在这里看见。

他们都享受不到心智的成果。”

——但丁

身处地狱之人，其悲惨之处在于，他们的心智长久地被狭隘自私的世界观所淹没，这样的世界观永远不能把他们引向真理。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只有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基础，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团结。狭隘的利己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的两大顽疾。然而，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被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有害思想所鼓动，去接受一种不符合我们真正阶级利益的世界观。这种自我毁灭的意识形态，鼓励我们把自身作为孤立的个体放置于历史的舞台上，在那里，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分析都被贬低为一句极端个人、极端利己的口号：“我能从中得到什么？”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世界与自身。

毛’主义不是武装身份政治

“虽然后现代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当下的装扮中它就广泛借鉴了尼采——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之父——的哲学。但它的逐步流行却有赖于后来特定的背景。

“共产主义的暂时退却，苏联和中国局势的逆转，以及在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达到高潮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停滞，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真空使后现代主义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在随之而来的悲观气氛中，后现代主义找到了成千上万的接受者，当中有些人甚至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他们因挫折而意志消沉。”——西拉杰

在西拉杰所描述的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地，后现代主义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左翼学术中心建立了霸权，成为大多数社会运动的默认分析框架，并渗透到网络空间与社交媒体中。这是一个有毒的苹果，当绝望的人们在没有一个现成的、革命性的方法，可用来分析和阐述特定群体所面临的各种具体压迫的情况下，就会去寻找它。

身份政治是后现代主义在 zǔo 派圈子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正如我们在这里使用的那样，“身份政治”一词是指一种分析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将身份认同作为最关键的因素，使其凌驾于政治路线之上。也就是说，它将面临压迫的个体所表达的观点视为无可争辩的真理。不言而喻，这种分析方法拒绝通过可靠的途径来获得真理，因为它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入而广泛的考察，依靠考察的结果进而作出的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可能会与当事人的个人或团体的意见相悖。

毛'主义在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时，认识到阶级压迫造就了一些身份，反过来也受到这些身份的影响。虽然这些身份是在白人至上主义和父权制社会的纷争中形成的，但主要基于这些身份来构建政治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错误。虽然身份可以对政治路线加以影响，但主体应当是政治路线本身，而不是身份。在这方面，为了坚持唯物主义分析与共产主义政治，必须对一切形式的“身份政治”加以批判和铲除。毛'主义承认特定压迫与重叠压迫的存在，但只有在

细致入微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分析的框架下才能对其予以真正的揭示。

自从西拉杰所描述的那种共产主义退潮的现象结束以来，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兴趣与日俱增。这种表现不光是因为人们已经开始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对特朗普的崛起以及民主党的缺陷做出反思，而且更广泛地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危机，及其所引起的两大后果：美帝国主义物质条件的变化和右翼意识形态的兴起。这些条件创造了一个可以将群众争取到马列 mao 主义运动中去的良好时机。但与此同时，在毛'主义政党缺席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向每一个倾向共产主义的人提供足够的政治教育。由于这些客观和主观的因素，许多自称毛'主义者或声称坚持马列 máo 主义的人，对他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其实有着深刻的困惑和误解。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只能讨论美国自身的状况，但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可能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 zǔ 翼来说是有益的。在这些国家中，后现代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着学术界与大学的霸权地位。这种霸权主义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几乎每一个网络空间，特别是像 Facebook 和 Tumblr 这样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这些网站与所有的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一样，都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并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再生产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其产生的后果，我们无需惊讶：总有人被误导，认为“马列 mao 主义=身份政治+武装

斗争+战斗性”。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我们在试图纠正这种错误想法的过程中，必须研究这一现象。

在美国最近的历史背景下，马列主义运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一种工人主义（workerist）政治（其本身就是身份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坚持一种欧洲中心论式的工人概念，即在工厂中劳动的白人工人），没能严肃而正确地分析诸如白人至上主义或父权制的压迫模式。正是欧洲中心主义、性别歧视、定居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导致前一个时代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有一种在分析中忽视受压迫群体的错误倾向。关于这点，最糟糕的莫过于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教条地专注于过去，只从少数几个被挑选出来的先知那里学习所谓的科学理论。

马列 mao 主义试图纠正这一错误，分析殖民主义和美国历史，并特别注意要正确了解内部殖民地、受压迫性别和其他的受压迫群体。这种细微之处立刻吸引了那些企图复兴后现代主义的人：他们开始倾向于 mao 主义，但还没有完全地掌握它的本来面目——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行动指南——反而采取一种静态的、非辩证的方式来看待马列 mao，就像唯心主义自由主义鼓励我们看待其他所有的意识形态那样：作为一个剧本或一套立场，如果你大体认同这些观点，你就可以把自己称作 mao 主义者。我们拒绝这一原则，坚持认为作为 mao 派，不仅要把 mao 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还要有组织地加以实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声称自己是 mao 主义者。

我们不应该像一些修正主义者那样，不经任何讨论就机械地拒绝身份政治。如果后现代主义是趁着共产主义失败的西风开始流行起来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认真理解身份政治的局限性及其流行原因的同时，直面这种失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找出隐藏在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中的真理内核。

身份政治最常见的表现之一是采用这样的一种分析，这种分析认为每一种压迫模式都有其独立的根源和系统，而不是正确地认识到阶级压迫——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需求进行剥削——是一切压迫的根源。有时它会试图通过使用一些新的概念诸如交叉性理论 (Intersectionality) 来纠正自己，但依然没有根植于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些压迫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但后现代主义理论无法科学而准确地确定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更别提如何应对了。

分析的要点在于，阶级压迫经常通过父权制和白人至上主义等压迫模式来作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正是依靠这些压迫所创造的物质条件，来不断地再生产着自身。然而，必须明白的是，阶级压迫是驱动整个制度的主要压迫。为了终结一切压迫，必须把阶级斗争作为关键环节，即使我们把其他形式的压迫理解为阶级压迫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剥削的各种途径。同时，这些压迫形式也反作用于阶级压迫，使之进一步发生变化，并不断地改善、升级着资产阶级用来胁迫他人或获取支持的方法。例如，统治阶级骄傲地指出，在最近发射导弹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的两艘军舰中，其中一艘军舰的指

挥官是一名女性。美帝国主义本身已经欣然接受了身份政治和交叉性等一套理论，并将其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机制，以便它在世界各地大肆掠夺和杀戮的同时，为自己的劣行提供道义上的掩护，同时试图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

那些真正想要结束这些压迫的人，也必须开始关注人类解放的总进程。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人都应当认识到，对于这些人，即使他们犯了错误，我们也要他们当作同志，要有耐心，要明白他们有着进步的愿望，因此具有革命的潜力。

身份机会主义在“左”倾中的表现

本文没有能力通过对上述缺陷的批判，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充实，但文章必须具体地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以何种方式污染我们当前的运动的，又是如何与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这种分析必须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身份政治”在共产主义圈子中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甚至一些最机会主义的身份政治家也会谴责“身份政治”是一种祸害。就像“修正主义”这个词汇一样，“身份政治”一词常常以一种随便得可怕的方式使用，这导致了认知上的混乱而不是使其含义更加明晰。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产生并不断再生产着每一个特定的被压迫群体。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

来运作我们的组织——即应当设法使被压迫群体在革命运动的领导层中有它们自己的代表。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依据群众路线这一领导方法来制定我们的路线，通过群众路线，我们将能在社会最受压迫的群体中发展出最先进的力量。

然而，最常被实践的身份政治，并不是一套为始终如一的、追求解放的愿望所驱使的政治，而是一种前后矛盾的、庸俗的身份机会主义。身份机会主义者只有在最方便他们掌控议程的时候，最能迎合其自私的野心的时候，最能吸引媒体和公众眼球的时候，才会诉诸身份政治。长期以来，这种狭隘的利己主义行为一直被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人视为毫无原则的和不可接受的。然而，与大多数其他形式的机会主义不同，许多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经常对身份机会主义的存在坐视不理。有这样两个可以理解的原因：一是新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拿不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到底是什么样子，从而产生了犹豫；二是一些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希望避免重复前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沙文主义缺陷，从而导致矫枉过正。但身份机会主义也很经常地通过一种阿谀奉承的行为来寻找掩护，我们将会在后文讨论。

例如，身份机会主义者可能会声称，一个奇卡诺（即墨西哥裔美国人——译者注）激进分子集团是由一个白人控制的，或者说他们不必接受一个黑人女性的领导，因为她据称被男人用种族主义和父权刻板印象洗脑，这与他们所宣扬的完全矛盾。在来自修正主义阵营的机会主义者们的攻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两种情况。

这些身份机会主义者既存在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存在于它的周围。我们中有许多人亲眼目睹或听说过，自由主义者阻拦有无证移民参与的直接行动，即使许多无证移民本身就很欢迎对抗性的策略。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革命将会使最受压迫的人受益，因此，身份机会主义往往是一个借口，以避免最有利于被压迫群体的斗争。就像所有的机会主义者一样，身份机会主义者本质上只关心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根本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除了时不时对那些备受压迫的人们表示一下关心。

身份机会主义的另一个有害表现就是坚持认为，激进组织中的白人同志是不会面临国家镇压的。这种主张——实质上是拒绝支持这些面临镇压的同志，因为机会主义者宣称这种“镇压”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在将这些同志出卖给国家机器。没有人会否认黑人和棕色人种的激进分子会面临更严厉的镇压，甚至可能遭到杀害。但我们绝不能把特殊身份带来的某种特权曲解为最根本的事物，从而错误地得出结论：对于那些来自“特权集团”的共产党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并不愿杀害或监禁他们，这些“特权集团”实质上已经成了为殖民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服务的叛徒。我们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其初期法西斯主义阶段，没有也不会对任何共产主义者心慈手软。

毛'主义认为存在着客观真理，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思想，最符合现实的思想是最正确的，完全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具体情况的思想是错误的。同时，身份机会主义者很容易对自己一套标准，对别人又是另

外一套标准。他们的机会主义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他们往往无法与被压迫群体提出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只要这种路线合他们的心意。

义愤文化不是一种有原则的批评

后现代主义在 zuo 派中最糟糕的一个影响，就是把毛'主义的批评方法歪曲成“义愤文化”（Call-out culture）。身份机会主义者尤其乐意使用毛'主义的语言来打扮他们的反革命概念。

正当的批评，应从真正关心人民和人民革命的实际利益出发。义愤文化拒绝这一原则，反而试图贬低、诋毁他人，以便谋取私人利益。义愤文化通常表现为在被“批评”的人背后表达对其的蔑视，而毛'主义意义上的批评则会直接呈现给犯错误的人。义愤文化攻击个人，而不是他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只是寻找替罪羊，而不是对运动中的缺陷进行切合实际的、细致入微的解释，因此它依赖于半真半假的陈述和浅薄的谎言。

义愤文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义愤文化背后的动机都是做出义愤者的个人满足，它试图向所有旁观者证明：只要你足够进步，你就能够识别其他任何人的错误，并大胆地提出谴责。义愤文化基于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它只是寻找供以攻击的靶子，而不是充分调查全面的、复杂的社会现实，因此它总是草率地

下结论，不可避免地犯下把朋友当作敌人的错误。共产主义的批评方法是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因为它明白整体大于局部，集体高于个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要克服这种主观主义，就必须很好地理解 MZD 在《实践论》中提出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这场运动中，政治营利和恃强凌弱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些东西应该从我们的思想中加以清除。即使这种行为被打扮成批评的模样，人们（不管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也都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它。这种虚伪的批评应该被彻底拒绝，并用来揭露那些提出所谓批评的人的机会主义动机。这样一来，这种无原则的攻击就只能在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中划出界线。义愤文化是懒惰的、报复性的、乏味的，完全低于毛'派所必须追求的崇高道德标准。

在那些除了社交媒体之外没有政治生活的人当中，义愤文化尤其普遍。他们的错误更加严重，因为他们并不对可行的组织结构负责，也就没有人来追究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且他们并不会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所做的批评除了让他们自己获得满足外，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除了在客观上有利于国家机器）。

最卑鄙的义愤文化实践者是那些无组织性的破坏者，他们把自己当成或幻想自己是运动的领袖，这种姿态如果不是那么具有破坏性的话，一定滑稽地让人发笑。许多这样的人相信发泄义愤可以实质性地孤立可能出错的人——甚至整个组织。然而政治孤立的运作方式并非

如此。必须指出，孤立的决定不能轻率地做出，更不可能在没有一个权威的情况下进行——为了施行孤立，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权威，才能够与对方对峙并执行判决。当敌人在某人的义愤中得到的好处远多于群众时，这个人就辜负了人民，转而倒戈向另一方。

对于那些难于根据其实际所处的位置组织起来的人来说——或者，更常见的是，对那些拒绝这种尝试的人来说——花费大量时间在 zuo 翼社交媒体上是非常普遍的。对于那些花大精力在网络上关注其他 zuo 派人士的人来说，诉诸于义愤文化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因为它被常态化了，而且（在短期内）比起坚持原则和以正确的方式做事更容易。正确的方式意味着调查、实践以及通过斗争发展起来的团结，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付出耐心、研究和辛勤的努力。

阿谀奉承者：自我贬低不是自我批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左翼社交媒体上花了些时间，并且目睹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白人蜂拥集结成网络游击队，发动了一场反对特权的神圣战争。这些人试图通过迎合那些被压迫民族的人（或其他面临压迫的人）的每一个观点来赢得他们的好感，变成了十足的马屁精，甚至不再费心去维持自己的政治路线。无论含蓄的还是明确的，那些做出迎合的人都没有（或者拒绝）理解，尽管特权因压迫的存在而存

在，但特权与剥削事实上是两回事。他们陷入了误区，害怕（或者自豪地宣布）自己本质上总是自然而然地成为被压迫者的敌人。无论是出于真诚的错误认识还是严重的机会主义，即使被压迫者在原则基础上走向了不利路线或是提出了错误观点，他们也不敢苟同。

当我们在上文谈及，必须要使运动的领导层中有被压迫群体的代表时，这种行为并不是我们所鼓励的。必须明确指出：阿谀奉承就是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等）。这是沙文主义家长制作风的一种表现，因为它认为被压迫群体的同志们太过脆弱，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想法，受不了批评，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它拒绝给予那些被迎合的人进行认真改过的机会。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正确的路线永远不会破茧而出，组织（或者，更像是，网友俱乐部）将只会在原地打转。

毛'主义认为，正确的路线只有通过于错误思想的斗争才能被发现，而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会把错误思想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在不断的斗争中，这些正确的路线也必须经过系统的纠正、考验和重新制订。阿谀奉承者不会斗争，也不能成为任何解放运动的有用组成部分，无论是为了民族解放还是为了结束父权压迫。他们往往成为存在于被压迫群体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附庸。他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革命计划（以及一分为二的革命真理），以便成为他们所认为的“好盟友”。但是，作为同志就意味着要彼此负责，互相支持，在犯错误的时候互相批评。

批评堕落为义愤文化的另一方面在于，那些阿谀奉承的“好盟友”们将自我批评变成了一种表演性质的自我贬低行为。对于那些坚持认为马列毛'主义=身份政治+武装斗争的人来说，所谓的自我批评往往不过是半心半意的道歉，对自己的贬低，或是对那些自身没有特权的旁观者们所采取的一种迅速的绥靖行为。

他们把自我批评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实际上有害于自我改造。表演性的自我批评只会把错误带到下一个错误或危机中。它或许确实能简单涉及到自己的错误，甚至会出于表演的目的而进行一番深入的研究，但它不会提供任何有意义或持久的改变。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剖析过自己，没有真正地去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实质上，他们拒绝这么做。就像吸毒成瘾者向亲人承认他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只是为了让亲人少管自己的事情，以便继续心安理得地吸毒，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吸食毒品的控制，也没有理性地理解他们的毒瘾程度。组织和集体必须坚决揭露这种表演性的自我批评行为，并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

这个社会的本质根植于资本主义剥削，因此，未经训练的人们在做出自我批评的尝试时，经常会由于假定的同侪压力、对批评不信任的社会倾向以及在批评的过程中缺乏信心，从而做出这种表演性的行为。犯这种错误的人自己就小瞧了自己（以及他们的同志），除非与资产阶级的自我发生决裂，否则他们将会永远留在狭隘的利己主义污秽之

中。表演性的自我批评在身份机会主义者中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行为并非阿谀奉承者所独有，往往也是由他们所迎合的对象进行的。

真正的共产主义的自我批评，总是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资产阶级的方面与无产阶级的方面，正确的方面与错误的方面等等分开来看。自我批评完全依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因此，在缺乏理论视角的情况下，自我批评是不能随意进行的，而且往往需要组织结构的介入。本文对如何正确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缺少全面的阐释，为了更好地学习，我们鼓励读者认真阅读《对 zhongguo G'C'D 的基本理解》一书，并注意“三要三不要”、“党的纪律”、“‘三大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些章节。我们的支持者应我们的要求出版了这本书，以便它能够成为所有全心全意地将毛‘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革命者的培训手册。

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者和精通完美话术的网络教授

“马克思主义不需要那些沉湎于某种僵死活动的知识分子们的赞扬，对于面临贫困和剥削，或者面临帝国主义冲击的人民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西拉杰

在美国的所谓“zuo 派”当中——尤其是在那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却除了互联网之外不属于任何实体组织的人当中——长期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那就是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词语挑选上，对每一个用词都费心尽力钻牛角尖，而不是去分析政治路线和政治话语的实际内容。这类人竞相看谁能够极尽所有正确的方式来说出错误的事情，并警告那些没有接受过他们那套吹毛求疵的精英话语规训的人。在实践中，这种行为相当于是对群众的谴责，群众的说话方式和用词挑选，对这些精通完美话术的网络教授们来说，常常是一种折磨和诅咒。

对他们来说，在辩论中用以攻击对方的证据几乎俯拾皆是，他们使自己的感知成为决定现实的东西，并将自己置于一切事物的中心。不管他们宣称自己的意图是什么，在政治实践中，这些人很少会与群众相遇，他们的方法只能形成狭隘的小集团，而不能真正地与群众建立起牢固的联系，更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依靠群众的党。这些把自己当成立法者的“摩西”们不准任何人犯错或变得“有问题”，以免他们被“孤立”。这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原则；他们错误地将普遍或流行的语言理解成语言的滥用，与此同时，也把群众推离了学习革命政治的道路。真正的悲剧在于，这些爱吹毛求疵的人本身就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几乎一无所知，但偏偏要去冒充权威指导他人该如何交流和行事。这是不招人喜欢的丑恶行径，它只会导致我们的运动中充斥着偏袒、道德沦丧和趋名逐利，把被压迫者的革命运动变成被**“被压迫者的奥林匹克”**（译注：Oppression Olympics，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团体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受压迫而相互竞争。这种“奥林匹克运动会”给压迫带来了一层道德色彩，在这种层面上，“最受压迫的人”更有价值）。

共产主义者在与他人交流的时候，要注意这种交流的主要内容并把握其中的本质，不能做出下意识的情绪化反应，或者对技术性细节吹毛求疵。共产党人必须对群众有信心，引导他们走向更高的层次，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加不切实际的、前后矛盾的条条框框。对经济基础的暴力革命，产生了社会变革；之后又以文化革命的形式继续革命，产生了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我们可以从那些历史上著名的革命中找到这句话的印证——譬如，曾提倡缠足的中国农民最终加入了红军。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他们的交流方式和思想意识是“有问题的”，但 zhongguo gongchandang 人并没有因此忽视或否认农民阶级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革命就不可能会发生，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将占据上风。这种吹毛求疵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把群众当作敌人，它反映了某些人根本不了解文化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不管承认与否，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没有武装斗争，没有群众的参与，改造社会的任务照样会成功一样。他们不寻求团结，说什么教育群众不是他们的工作。我们甚至看到一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在他们愿意向新的共产主义支持者解释压迫机制之前，就开始要求得到报酬了。这些走狗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一

开始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只不过是一帮精英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而已。

对身份机会主义路线的结论

或许身份机会主义最严重的罪行，在于它擅长伪装自己，毒害同志，使他们彼此争斗。它用极“左”的方法推进右的路线。正因为因此，身份机会主义对被压迫群体伤害最大，它利用他们所遭受的压迫，来达到狭隘的利己目的。在美国，只有三大革命法宝——党，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的同心同德的建设，才能真正地有利于被压迫人民。而身份机会主义极大地危害和阻碍了这一建设。

拒绝纪律，找借口，称试图提供帮助的人为“诽谤”

身份机会主义，像后现代主义在左派中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样，拒绝共产主义的纪律。诸如“不能剥夺吸毒者的人身自由，也不能剥夺他们吸毒的权利”和“儿童有能力同意性行为”（由身份机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实际论点！）这些概念都是建立在极端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已经完全滚到了反动的一边。共产主义者不是浪荡公子哥儿。我们绝不是那种把个人置于集体之上的自由主义者，恰相反，我们将集体、党和群众

的利益放在首位。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必须服从纪律，既不为不守纪律找借口，也不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来为错误开脱。即便我们当中的残疾人士也清楚：当我们犯错误时，必须进行自我批评，绝不能以自己的残疾为借口拒绝纠正错误，也不能像身份机会主义者一贯擅长的那样逃避批评。个人所受的压迫和不幸的生活经历，是我们用来激励自己在解放事业中继续前进的，绝不是把它当成拒绝做共产党人该做之事的借口。我们有纪律地与敌人抗争，不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的利益之上。

对共产主义者来说，纪律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使革命运动获得历史性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纪律，我们将什么也做不成。我们坚信，任何人，无论其能力如何，都能够通过实践来提高自己的纪律水平。我们寻求理解和改造社会，而不是成为群众难以接受的反社会极端分子。我们不能表现地好像社会关系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悲惨的世界中且不得不受到它的影响，而同时我们也想要彻底地改造它，为了处理这个矛盾，我们主要依靠纪律：我们服从多数，服从组织的领导。话虽如此，但还是必须指出，多数并不总因为他们是多数而变得天然正确。在许多历史案例中，恰恰是少数人坚持了正确的路线；例如，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相比于大多数服从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家来说，就是正确的。即使大多数人都支持身份机会主义的错误原则（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我们也不会屈服，不会因此放弃我们的立场——我们只会努力地纠正这种错误，整顿我们的

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价值观能很好地服务于我们整个运动——同样，假装我们必须服从随机的、无组织人士的领导，也是荒唐可笑的。这是完全的右派作为，然而基于身份政治的影响，肯定有人会提出如此荒谬的要求。

无产阶级从后现代主义和机会主义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必须在坚定不移地为阶级问题服务的过程中与之划清界线。

论网络行为

与前几代的革命者不同，我们将面临的是这样一种非比寻常的现象，它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普及，使本来就极端复杂的社会现象又产生了许多复杂的新问题。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其加以分析，并制定出一套原则性的网络行为守则。

不消说，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互联网滋生了许多不诚信的恶意为。比起面临现实中的破坏（攻击，甚至直接的人身危险），它缺乏真实和严重的后果。并且，一般而言，互联网难以让人们以一种彻底的、全方位的方式互相接触和互相了解。因此，网络互动往往呈现出一种肤浅、虚伪、轻浮的特性。这些条件为身份机会主义者和其他爱出风头的江湖骗子们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永远不缺狂妄自大的

Youtube“毛派”便足以证明这一点，那些社交网络账号不过是一些自娱自乐、追求他人肤浅赞美的“马甲”；那些自称是共产主义领袖的人，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什么领袖。如此多的人从网络骂战中获得满足，然后兴高采烈地期待下一轮的恶毒情节。在过去，他们可能会满足于青少年电视剧或肥皂剧，但今天他们正积极地煽动网络闹剧。在美国，这个问题要比其他国家来得严重。消解它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把它当回事，不要去迎合它，并为提出与接受批评而设立更高的道德标准——简而言之，不要受它的影响，不要堕落到和那些人一样，不要做出恶意诽谤、乱贴标签这种无耻的行为。

当涉及到互联网问题时，我们既不能采取极“左”或右倾的方法，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群众本身就在使用社交媒体，并且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通过网络空间发现共产主义政治的——我们必须要以一种严肃的、原则性的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在这一领域展开斗争。我们不能低估互联网在当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但也不能高估了它。许多人要么过分地强调对互联网的介入，要么几乎完全回避网络行为，并没有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我们很容易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自称是“集体”或“党”的 Facebook 主页，但与实践无干的 Facebook 主页并不能准确地代表组织实力，也不该与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相混淆。更重要的是，缺乏网络行为并不意味着缺乏实践活动。我们许多干部根本不使用社交媒体，虽然他们最终还是用了，但那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了解最近的网络热点事件。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没有满足不认识的

人所提出的要求，我们受到了批评。许多所谓的左翼分子似乎只存在于 Facebook 上，把他们自己幻想成一个共产国际。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接受任何实体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还喜欢从旁侧指点一些对组织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并认为自己那些脱离实际的主观分析是最深刻、最彻底的结论。当然，这种坐在看台上当指挥的行为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互联网所独有的——尽管如此，这种过度的自我膨胀在运动中是不被看好的。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三个 Facebook 好友，组建一个聊天群，并把这个称为一个“集体”——但这并不构成一个合法的、真实的、有群众基础的组织。一个人无论参与了多少网络争论，实质上他仍然没有真正地为人民服务。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那些好心人士——他们主要是通过网络发现并走向共产主义的——也很容易在不经意间犯下这样的错误，即误以为在网上遇到的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反映出广大群众的情况。譬如，他们可能会开始认为，劳动人民已经很熟悉并欢迎共产主义，或者（如果遇到许多反动派）他们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事实上，如果不深入工人阶级，团结劳动群众，就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当地的工人阶级到底需要什么、思考什么、关心什么。一个更大的危险——更明显也是更难以证明的危险，但似乎困住了许多人——就是相信，要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仅仅呆在网络上造梗或发贴就足够了。但要清楚，正如 MZD 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只有“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否则就不能称自己是一个共

产主义者。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需要的不仅仅是自己在 zuo 翼社交媒体上一时的心血来潮。

虽然社交媒体可能会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但是不要把它和最重要的东西混为一谈。社交媒体聊天、谷歌环聊和留言板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支持者讨论革命组织的地方——我们有更安全、更稳健的沟通方式，在这一点上犯糊涂的同志将很难负责地处理技术性问题，如果他们真的参与到激进工作当中，就会把自己置于暴露的危险境地。

关于安全问题，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并且想要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在以一种非常规范的方式公开个人信息之前，应该谨慎考虑，即使这种公开是面向工人阶级群众的也要如此。许多好心的同志把自己置于被法西斯分子骚扰、人肉或更糟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对各种身份和个人信息的处理过于松散。令人震惊的是，居然有不少人，即使其好友列表里有许多完全不认识的陌生用户，他们还是经常发布自己最新的照片，提供他们常在地的信息，甚至发表许多可以供法西斯分子（以及国家）利用来操纵他们的私密心理和感情细节。更糟的是，这些人往往倾向于公开讨论自己所属的组织，甚至讨论还有谁属于其他的组织。这只显示了他们自身经验的局限性和他们“组织”发展水平的低下。如果他们完全感觉不到来自国家的威胁以及日益增长的法西斯支持者的威胁，那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成长为压迫制度的真正掘墓人。

后现代主义学术界毫无疑问地污染了网络空间和社交媒体，它带着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主要使命，即提出“有趣的观点”或“新”的框架——这种体制性的任务不是基于以科学的方法努力改造世界的愿望，而是出于攀附和盈利的动机。不管这些方法看起来多么“有趣”，一旦付诸实践，就会名誉扫地。事实上，它们不过是由形形色色的馊主意拼凑而成的毫无意义的混合物，这些东西串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某种激进的、全新的事物。旧观念总是要重新打扮自己，在“新范式”的表象之下，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胡说八道。

利用网络与他人进行社会与政治上的互动，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错误。而且我们懂得只要运用得体，这种互动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们绝不是要贬低所有的社交媒体互动。但我们寻求以更好地方式去利用它，来使人民受益——而不仅仅是提升个人的自我意识，打造个人的品牌，为争夺一小群易被打动的仰慕者而相互竞争。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和博客的关注数完全归功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以及对这项工作的理论化。

同样，那些花费大量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的人，应该对网络空间中常态化的极端个人主义文化抱有深刻的怀疑。毫不意外，社交媒体公司和它的支持者们不断地传播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鼓励用户去寻找肤浅的“个性”，并以此来打扮自己，变成一个奇观，来讨好那些他们几乎不认识的人的欢心。这种习惯性的和难以克制的自我陶醉，对于共产党

人的生活——一种面向广大群众并为其服务的生活——来说，是非常有害的。

更危险的是，在网络上许多自认为是左派的人士当中，存在着一种互相给予不加批判的赞扬与安慰的风气，而这些人实质上不可能真正了解彼此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做法对真正的共产主义方法是完全有害的——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应该努力去分析它们并做出改变，而不是彻底的愚弄自己，让远方的熟人安慰我们。

一旦一个人意识到资本主义不过是罪恶和腐朽的集合，共产主义是取代它的必由之路，人们就会去寻找那些能够理解这点的人，向他们宣泄不满和倾诉挫折——特别是当这个人离开互联网回到现实生活中，唯一能遇到的意识形态不是自由主义就是反动的时候。然而，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一种亚文化，谁把它当成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谁就与它背道而驰。对于那些已经受到启发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用来安慰人的文化试金石——它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信奉斗争的。资本主义是商品化的一股强大力量，正如它在过去制造了切·格瓦拉的T恤一样（这既是为了宣传修正主义的神话符号，也是为了消解切·格瓦拉自身的革命性），现在它制造了一些所谓“共产主义主题”的meme团体，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团体里往往充斥着大量躲避群众的人。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应当受到严厉批评。

这并不是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完全没有幽默或 meme 的存在空间。事实上，正如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另类右翼 meme 的传播一样，许多人最开始也是通过遇到共产主义的 meme 因而被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一矛盾？什么样的共产主义 meme 才是有益的？如果它们有意识地吸引人们走向共产主义，而不是轻视或贬低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意义，那么它们就是有益的；如果它们为从事困难的、必要的政治工作的同志提供休息和肯定，那么它们就是有益的；如果它们促进无产阶级文化，揭露资产阶级及其忠实仆人的暴行、堕落和虚伪，那么它们就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在制造 meme 这件事上耗费太多精力，对待它过于郑重或赋以过多的正当性，都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的一些成员和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太过与人对立，为此我们受到了同志和敌人的公正批评。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些批评，停止了所有此类行为，并且寻求以当面接触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和展开斗争，在当面接触行不通的时候再考虑采取其他的联系方式。我们不再在自说自话的左派小圈子里进行工作，我们不会容忍 Tumblr 上无休止的猜测和吹毛求疵，就像我们不会容忍 Reddit 上右翼喷子的观点一样。Facebook 并不是一个能在组织层面上解决重大问题的地方，我们的成员也不会再与无所事事的网络知识分子们争论不休。

如果我们对待真正的同志不公，像描绘反动分子一样描绘他们，我们的成员会直接向他们做自我批评，并试图做出补偿，今后我们将更

谦逊的、更怀善意的地开展工作。还必须理解，作为一个在奥斯汀街头积极领导现实斗争的集体，我们没有时间对 Facebook 上的每一条批评或攻击做出回应。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关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而是因为，要我们像和已组织起来的合法集体打交道那样，与每个人都展开个人层面的接触，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样，我们也不能假装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没有持续的原则性工作的集体值得我们立即的关注。基于团结的斗争必须围绕实际活动和群众工作展开，而不是围绕偶然的行动或随机参加的示威展开，更不能围绕着一个精心构建的网络形象来展开。

身份机会主义主要通过互联网传播，并在网络空间中找到它的主要阵地；它的“基本盘”是那些很少在群众中组织起来、将大把的时间投入到网络争论中的人。身份机会主义者喜欢听到自己愤怒的呼声被网络上那些意志薄弱的追随者们回应。幸运的是，这些人并没有能力把群众组织起来并引导他们走向解放，他们不过是一些言之无物的、自说自话的人。群众确实嗅到了这些江湖骗子们散播的“共产主义”的臭味，他们永远不会想要与它产生任何联系。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利用社交媒体来宣传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没有实际工作的支持就不应该进行宣传。战略和路线的制定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过分地重视社交媒体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灾难性的错误。

虽然身份机会主义植根于后现代主义，但我们也必须指出，后现代主义本身并没有停滞不前。然而，它无法超越自己的形而上学根源。

毛'主义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科学，应该坚决反对形而上学，决不能堕落为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任何公式。无论出于善意还是机会主义，任何形式的身份政治都必须被加以严格防范。mao'主义者必须围绕着夺取阶级权力的目标来团结广大群众。任何声称将这样做但却对广大群众的福祉毫无兴趣的运动或分析，我们必须明确地揭发其欺骗群众和反革命的本性。

在唯物主义分析的坚实基础上建设党！

揭露机会主义者，拒绝后现代主义者！

——奥斯汀 hwb (Red Guards Austin) ， 2017 年

发布于 2019-07-02